

北朝鮮半文化  
之歷史作用

繆鉞題簽

呂一飛 著

黃山書社

## 序 论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古代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融合，故近世治魏晋南北朝史者，莫不极重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问题。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马克思曾指出：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恩格斯也曾指出：

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反杜林论》，同上，第3卷第222页）

这就是说，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文化较低的民族最终将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这无疑是中外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

但是，世上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倒过来考察，人们不禁要问：民族融合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过程，犹如长江大河，有主流，也有回流，文化的交汇和影响亦并非都是单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程度较低的征服者民族的文化，对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及其文化又将产生何种作用和影响呢？恩格斯在《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深刻指出，公元5世纪，野蛮的德意志人入侵罗马帝国后，曾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象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著作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部落，并且正处在充满生命力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单行本第153—155页）

恩格斯这一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它表明：落后的征服者民族的文化对于先进的被征服者民族及其文化来说，并非全是破坏和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尚存十分积极的历史作用！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是否也发生过这样类似的历史现象呢？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富于挑战意味的颇具价值的研究课题。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主要发生在北方黄河流域。

自洛京倾覆，典午南渡，史称“五胡”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割据中原，建立政权，成为统治民族，与南渡的汉族封建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及至杨隋建国，一统天下，其间凡280余年（公元307—589年），经过长期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北方各少数族（包括长久居统治地位的拓跋鲜卑），皆基本融合于汉族之中，被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同化。这一汉族文化作用、影响北方各少数族的过程，即史家常说的“汉化”，也即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

的征服者被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了。

但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固不仅限于汉化一途，北方诸胡族文化对汉族及汉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亦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可忽视。对这一历史现象，姑沿用史家之旧词，简称为“胡化”。而魏晋南北朝诸胡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尽相同，有大有小，未可等量齐观。“五胡”之中，鲜卑最为活跃，故此时期的“胡化”，主要即为鲜卑化。魏晋南北朝的鲜卑化，以拓跋氏统治的北朝为甚，所以我们以此为讨论的重点。

本文所谓的鲜卑化，包含两个内容：

第一，从种族角度考察。

自永嘉之乱，“五胡”长期迭据中原，经过世代的变迁，岂无胡化之汉人出现？史载，十六国时北燕君主冯跋，即为鲜卑化之汉人。《魏书·海夷冯跋传》：

冯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慕容永僭号长子，以跋父安为将。永为垂所灭，安东徙昌黎……（跋）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北齐的开国者高欢，亦为鲜卑化之汉人（详见后文）。足见当时北方部分汉人，颇有渐融于鲜卑者。

第二，更着重从文化角度考察，即以北朝鲜卑文化对汉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来考察。

在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汉族文化与北方草原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化两者之间，有异同，有冲突，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不断地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更新与充实。北朝时，塞外之拓跋鲜卑入主中原，遂将其文化带入黄河流域。在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鲜卑文化对汉族传统文化之冲击、渗透，以至于融合、充实之作用，表现得尤为显著。及至杨隋统一，李唐继之，朝气蓬勃，文教昌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其所以致此之故，虽有多端，

而北朝文化(尤其是鲜卑文化)的影响,实为不可忽视之事实。此亦治史者所宜留心,而也正是我们将重点阐释的。

总之,魏晋北朝的鲜卑化,乃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其产生和发展,自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治史者岂可置之不论!抑进而观之,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诚然是汉化,但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常会发生曲折和倒退,若就某一具体时期而言(如北齐和北周),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论(如北魏后期的北边州镇),此种鲜卑化现象所占地位甚为重要,予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之影响甚大,更不可以忽略!

然而,晚近之治史者,注意力多集中于汉化,对鲜卑化则未甚留意。以笔者之孤陋寡闻,迄今未见前人有专文论述此问题;偶有论及鲜卑化者,也是多谈其消极作用,而忽略其积极作用。因此,在北朝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所见不够全面。这确是当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一大缺憾。故笔者不揣浅陋,草撰此文,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的重视和讨论,共同填补这一空缺,促进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最后,有必要强调:北朝民族融合的主流,仍是汉化;在这一总趋势的影响和制约之下,彻底融于鲜卑的汉人,毕竟是少数;而鲜卑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从总体来看,也仅是局部的和有限的;所以,北朝的鲜卑化,在普遍意义上,只能理解为一种倾向。对这种历史现象,完全忽视它,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夸大它,也是不对的。所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述这一历史现象,是本文所要努力遵循的一条原则。

# 目 录

|                      |     |
|----------------------|-----|
| 序 论                  | 1   |
| 第一章 拓跋鲜卑的文化          | 1   |
| 鲜卑拓跋部的形成发展过程         | 1   |
| 拓跋鲜卑文化的性质及其基本内容      | 15  |
| 第二章 北朝的鲜卑化倾向与北朝政治的关系 | 31  |
| 北魏前期削除鲜卑旧俗的斗争        | 31  |
| 北魏中期的汉化运动            | 39  |
| 北魏末鲜卑化潮流的勃兴          | 51  |
| 高齐和宇文周的鲜卑化倾向         | 62  |
| 第三章 北朝的鲜卑化倾向对士族高门的影响 | 75  |
| 士族的衰落与寒庶的崛起          | 75  |
| 士大夫风气的转变             | 83  |
| 第四章 北朝的鲜卑化倾向对隋唐的影响   | 92  |
| 隋唐之际地主阶级成分的局部更新      | 92  |
| 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           | 98  |
| 唐代的婚姻、服饰和舞乐          | 100 |
| 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            | 112 |

|          |     |
|----------|-----|
| 结 论..... | 114 |
|----------|-----|

|                     |     |
|---------------------|-----|
| 附表一 西魏北周赐鲜卑姓氏表..... | 117 |
|---------------------|-----|

|                      |     |
|----------------------|-----|
| 附表二 西魏北周及隋士族尚武表..... | 124 |
|----------------------|-----|

|          |     |
|----------|-----|
| 后 记..... | 132 |
|----------|-----|

|                            |     |
|----------------------------|-----|
| 插图一 大同云岗石窟十七窟南壁东龕供养人 ..... | 106 |
|----------------------------|-----|

|                            |     |
|----------------------------|-----|
| 插图二 大同云岗石窟十七窟南壁东龕供养人 ..... | 106 |
|----------------------------|-----|

|                                   |     |
|-----------------------------------|-----|
| 插图三 大同云岗石窟十九窟门拱东侧释迦多宝佛龕下供养人 ..... | 107 |
|-----------------------------------|-----|

|                            |     |
|----------------------------|-----|
| 插图四 唐戴帷帽骑马女俑(郑仁泰墓出土) ..... | 107 |
|----------------------------|-----|

|                              |     |
|------------------------------|-----|
| 插图五 唐戴帷帽骑马女俑(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 107 |
|------------------------------|-----|

## 第一章 拓跋鲜卑的文化

北朝一代，拓跋鲜卑为统治民族，故北朝的鲜卑文化，主要即鲜卑拓跋部的文化，自无疑义。那么，拓跋鲜卑文化的性质及其基本内容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对拓跋鲜卑形成发展的过程作一番考察。

### 鲜卑拓跋部的形成发展过程

拓跋鲜卑初期的历史，据《魏书·序纪》，似乎可以追溯得很久远，但其中多半是伪托，自然不能全信。加之秦汉以来，拓跋氏地处遐远，未通华夏，故史载无闻。这段历史，一直被浓厚的迷雾所笼罩，令人茫然不解。

但是，近年考古的重大发现，已把这迷雾捅开一个小口，可窥探其中若干历史的真象。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嘎仙洞，发现了拓跋部南迁以前开凿的宗庙石室旧墟。这确切表明：拓跋氏祖先发源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曾以射猎为业（参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2期）。这一时期的拓跋氏，处于闭塞的环境，未与外界交通混杂，故可称之为狭义的拓跋鲜卑。可惜目前我们对它的情况，还无法说得更多一些。

后来，拓跋氏开始了南迁。最初，宣帝推寅南迁大泽，方千

余里，即今蒙古草原东端呼伦池。献帝邻时，又命儿子诃汾再次南迁。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抵匈奴故地，即今蒙古草原南部阴山一带。

拓跋氏两次南迁，究竟在什么时候，这很重要。黄烈先生《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一文考证甚有理据。黄烈先生认为东汉前期，宣帝推寅率部进行第一次南迁，抵达呼伦池，驻牧约百年左右；东汉末桓、灵之时，诃汾复率部南迁，始抵匈奴之故地（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笔者同意这一看法。

拓跋鲜卑南迁经过既明，下面就考察它的形成发展过程。

据《魏书·序纪》，拓跋鲜卑似乎早在第一次南迁之前，即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时，就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部落集团：

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

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但对这段文字，似未可轻信。笔者读史每至于此，总不免生出几分疑惑：这众多的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为何后世却几乎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呢？吕思勉先生亦有所诘难：“统国三十六，四面各九国也。大姓九十九，与己为百姓也。数之巧合，有如是者乎？”（《吕思勉读史札记·论魏史之诬》）看来，这段文字颇杂后世夸诞之词，不能全信。但由于史料的佚阙，当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现已难于确知。故拓跋部较为可靠的形成发展过程，目前只能从南迁以后谈起。

前已言之，拓跋氏的两次南迁，都发生在东汉时期。这时，蒙古草原上民族融合的局面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动，故不能不予拓跋部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

古代我国北部大漠活动着许多少数民族，匈奴、鲜卑、乌丸、高车、柔然等，即其中之著名者。

汉晋以来，大漠南北，变动频仍，各族兴衰迭起，杂处错居，乃至相互交融，民族融合极为复杂。然而拨其烦细，究其大端，

其发展演变之概况，亦可略而言之。

秦汉时，我国北部大漠，最强大的是匈奴人。

自汉初冒顿单于之勃兴，匈奴的霸权控制蒙古草原，长达200余年，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吞楼烦、白羊，北降服浑庾、丁灵。这一时期，草原上的民族融合，呈现出一种匈奴化倾向。《史记》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武帝元朔二年，匈奴相月氏附汉，封为亲阳侯。相，乃匈奴官职（参《汉书·匈奴传》）。这个任匈奴相的月氏，当是融于匈奴的月氏人。

东汉以降，形势大变，匈奴日趋衰弱，鲜卑取而代之，故东汉中期，草原上的民族融合渐渐转为鲜卑化的倾向。《后汉书·鲜卑传》：

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5年），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种击败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落即户——引者注），皆自号鲜卑。

及至拓跋氏南迁蒙古草原，遂顺应了这一潮流，兼收并蓄，融汇其他各族于自身，发展壮大起来。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魏书·官氏志》对此有概括的叙述：

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

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

所谓献帝时，即拓跋氏驻牧于呼伦池的后期。献帝七分国人，使七个兄弟各摄领之，且改易诸兄弟的姓氏，分别为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亥氏（参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官氏志》及所附《校勘记》），献帝本人又以拓跋氏名号自领一部，共为八部。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旌氏，疏属曰车焜氏，加上前述八个姓氏，共为十姓。这便形成了拓跋部的核心，即后世所谓的“鲜卑八国”或“帝室十姓”。这是第一阶段。

所谓“自后兼并他国，……为内姓焉”，是指拓跋部南迁阴山后，在大酋长拓跋力微率领下，大肆兼并他族的过程。《魏书

·官氏志》载：神元皇帝时（即拓跋力微），余部诸姓内入者，共七十五姓。足见归附者之众。这是第二阶段。至此，以拓跋氏为宗主，以“八国”、“十姓”为核心，统摄广大内入诸姓的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便宣告形成了。这似可称之为广义的拓跋鲜卑（按文中自此以下所谓的“拓跋鲜卑”，皆指此义而言，请读者留意）。

由此可见，后世概称的“拓跋鲜卑”者，其中固多掺杂草原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分，如乌丸、匈奴、高车等等。换言之，此即草原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一部分，逐渐融汇于拓跋鲜卑之中，一步步鲜卑化了。

那么，北方各少数民族鲜卑化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些民族的文化风俗，多与鲜卑大同小异，故欲辨别其是否鲜卑化，颇难以此为准。今可据其姓氏，参证以史实，略作推求。《魏书·官氏志》所载一百二十姓，皆北魏太和中改为汉姓之代北诸姓。其中帝室十姓，当是鲜卑无疑；内入诸姓凡七十五姓，皆拓跋力微时余部诸姓内入者，年代久远，自应视之为鲜卑。此八十五姓中，有本源为鲜卑者，今置之不论；有本源不明者，亦置之不论；有本源为其他胡族而融于鲜卑者，今考释于后。此八十五姓之外，又有经考证确系其他胡族而融于鲜卑者。亦附于后。

#### 第一、乌丸的鲜卑化。

乌丸本东胡的一支。汉初，乌丸为匈奴击破，避而东迁。东汉时，匈奴衰乱，北匈奴远遁，南匈奴降汉，漠南地空，乌丸趁势逐渐南徙，列布于缘边诸郡。嗣后，鲜卑勃兴，尽据匈奴故地，乌丸遂与之居处相邻，其语言风俗，多与鲜卑大同小异（参《魏志·乌丸鲜卑传》），故其族之融于鲜卑，并非难事。现考释如下：

一、乌丸氏。《魏书·官氏志》（以下简称《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乌丸氏，后改为桓氏。

北魏明元帝时，鲜卑叔孙俊娶妻桓氏（《魏书·叔孙建附子俊传》）。北魏太武帝时，有执金吾桓贷（《魏书·世祖纪》），皆原为乌丸族人。

## 二、那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那氏，依旧那氏。

按《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曹操灭乌丸蹋顿，凯旋，“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可知那氏当为乌丸族。北魏道武帝时，有辽西太守那颀。胡三省曰：“那，诸何翻，姓也。《魏书·官氏志》内入诸姓有那氏。”（参《通鉴》晋纪三十四·安帝元兴元年）。那颀其人，当原是乌丸族。

## 三、薄奚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薄奚氏，后改为薄氏。

按《晋书·石勒载记上》：“乌丸薄盛执渤海太守刘既，率户五千降于勒。”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以下简称《胡姓考》）薄氏条引上文加按语云：“可知薄盛原为乌丸酋帅，其原姓当作薄奚。《晋书》唐修，以新姓蒙旧耳。”

以上列举了三姓，毫无疑问，融于鲜卑的乌丸固不仅此三姓。《官氏志》云，拓跋什翼犍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来附者既为杂人，为何却总称乌丸呢？盖其人实以乌丸为众，他族莫能相比。足见乌丸之融于拓跋部者，数量不少。

## 第二、匈奴的鲜卑化。

秦汉时，我国北部大漠，最强大的是匈奴人。这时，草原上的民族融合，呈现出一种匈奴化倾向。及至东汉，匈奴衰落了，从蒙古草原霸主的地位跌落下来，鲜卑取而代之。草原上匈奴余部十余万落，丧失了昔日的凭借，逐渐融于鲜卑，皆自号鲜卑兵（参《魏志·乌丸鲜卑传》注引《魏书》）。这是史书上最早的关

于匈奴融于鲜卑的记载。拓跋部之崛起，加速了蒙古草原匈奴各部融于鲜卑的进程，其可考者如下：

### 一、纥豆陵氏。《官氏志》四方诸姓条：

次南有纥豆陵氏，后改为奚氏。

据《魏书·序纪》载：拓跋氏初抵阴山，部小力弱，为西部所破，种族离散。故拓跋力微不得不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奚宾，娶其女为妻。奚宾死，力微乃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降服。足见拓跋氏之兴起，实借没鹿回部之力。奚宾，本名纥豆陵宾，魏收撰《魏书》，以新姓改易旧姓耳。

纥豆陵氏原本何族呢？史家多以为是鲜卑。但笔者以为，其族颇有出自匈奴之嫌疑。《周书·奚契传》：

奚契字光成，扶风平陵人也。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

按纥豆陵氏为胡族，史载甚明，传文附托窦章之后，自不足信。但言其先世乃匈奴部落大人，恐得其实（按《元和姓纂》五十河南奚氏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河南奚氏条皆言奚统避难，亡入鲜卑拓跋部。二书成书皆晚于《周书》，故不采其说）。马长寿先生有一精辟的见解，认为“拓跋”一名，由“鲜卑父胡母”的婚姻关系而来，是鲜卑与匈奴融合的结果（参《乌桓与鲜卑》总叙）。今检《魏书·序纪》，拓跋部之妇家，力微以前俱不可考，始有明确之记载者，乃力微之妻奚氏。以马先生的看法推之，与力微联姻之奚氏，自应为匈奴，“拓跋”之得名，恐即出于此。

### 二、呼衍氏。不载于《官氏志》。《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

按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秃发”即“拓跋”，史有定论（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二十二）。马长寿先生认为，“胡掖氏”即匈奴贵姓“呼衍氏”之异译，“胡掖”、“呼衍”实一语之转（《乌桓与鲜卑》总叙）。足见鲜卑拓跋氏（秃发氏）之初，多与匈奴通婚，这是证据之二。《汉书·匈奴传》匈奴贵姓呼衍氏条颜师古注曰：“呼衍，即今鲜卑姓呼延者是也。”昔日之匈奴贵姓，已被视之为鲜卑了。

三、须卜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须卜氏，后改为卜氏。

按《史记·匈奴传》：“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四、贺赖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贺赖氏，后改为贺氏。

五、贺兰氏。《官氏志》四方诸姓条：

北方贺兰，后改为贺氏。

按贺兰氏即贺赖氏，“兰”、“赖”一音之转，乃匈奴族，《胡姓考》贺氏条考证甚精，此不赘。史载，拓跋部屡与贺兰部联姻，互为舅甥之国。拓跋氏之初，多与匈奴通婚，这是证据之三。

六、丘林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丘林氏，后改为林氏。

按丘林氏本南匈奴名族，史有明文，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七、出（步）大汗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出大汗氏，后改为韩氏。

《胡姓考》韩氏条考证：“出”乃“步”之讹，步大汗氏即破六韩氏，本匈奴族。今从其说。

八、独孤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独孤氏，后改为刘氏。

按独孤氏本匈奴族，史载甚明（参《北史·刘库仁传》、《魏书·

铁弗刘虎传》)。其家族派生出两支。其中刘库仁一支，归降拓跋部甚早，通婚频仍，屡任南北部大人，是其渐融于鲜卑之证(参《魏书·刘库仁传》、《魏书·外戚·刘罗辰传》、《北史·后妃传》)。但铁弗刘虎一支，却始终是拓跋部的世敌，为争夺大漠南北之霸权，二者激烈抗衡近百年。公元391年，铁弗部被击溃，拓跋部始稳定了其霸主地位。蒙古草原各少数民族最终之所以趋于鲜卑化，这是一个关键。

九、是连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是连氏，后改为连氏。

按：“是连氏”亦作“是兰氏”。《通鉴》梁纪二十·敬帝太平元年(公元556年)载：北齐文宣帝时有黄门郎是连子畅。《北史·毕义云传》又载：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公元562—565年)，毕义云被其子杀害，“旦日，武成令舍人是兰子畅就宅推之。”两事年代相近，应为同一人。故颇疑“是连氏”即“是兰氏”，译言无定语。又，考之史籍，是兰氏本匈奴族。《汉书·霍去病传》去病杀匈奴折兰王条颜师古注：“折兰，匈奴中姓也。今鲜卑有是兰姓者，即其种也。折音上列反。”

十、宇文氏。《官氏志》四方诸姓条：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

宇文氏本匈奴族，史有定论。周一良先生《论宇文周之种族》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考之甚确，此不赘述。周先生又说：“《魏志》三十《鲜卑传》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宇文氏疑即此类。”看来，宇文氏之始融于鲜卑，似乎早在东汉中期。北魏末，六镇兵起，武川镇鲜卑化之匈奴人宇文泰乘乱割据关陇，建立了西魏和北周。

以上为匈奴之融于鲜卑者，共十姓。

### 第三、高车的鲜卑化

高车，又名敕勒、丁零。原居匈奴以北，在今贝加尔湖及其西，直到今锡尔河以北一带，史称丁零。汉初，丁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征服。公元一世纪，匈奴衰弱，北匈奴西遁，漠北地空，于是发生了蒙古草原各少数民族的大迁徙运动。乌丸、鲜卑向西南转迁，占据匈奴故地。高车也开始自贝加尔湖向草原中部南迁，但很快被公元二世纪崛起于蒙古草原的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军事大联盟所阻止。东汉灵帝光和年间，檀石槐死，鲜卑军事联盟冰消瓦解，高车大规模的南迁才有了可能（参周伟洲先生《敕勒与柔然》第8—19页）。最迟在公元三世纪，部分高车已迁到草原南部，游牧于阴山，乃至有入塞者。《晋书·北狄匈奴传》载，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北狄入塞共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赤勒种即其中之一。赤勒即敕勒，译言无定语。这部分高车可称之为漠南高车。而留居漠北之高车，公元四至五世纪，大部被拓跋魏征服，强迁至漠南，措置于北边六镇及河西。高车之南迁过程既明，下面就叙述高车的鲜卑化。

高车之鲜卑化，最早可追溯到拓跋部南迁之时。

#### 一、纥骨氏。

#### 二、乙旄氏。

据《魏书·序纪》和近年的考古发现，拓跋部原居大兴安岭北段，东汉前期开始南迁，初抵呼伦池，驻牧甚久；东汉后期，诃汾复率众南移，始达匈奴之故地。前文已述，东汉前期，贝加尔湖的高车已渐南迁，呼伦池正当其东南，水草丰美，故南迁的高车与南迁的拓跋部相遇于呼伦池，实为情理中之事。《官氏志》帝室十姓条：

至献帝（诃汾之父——引者注）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旄氏，后改为叔孙氏。

马长寿先生认为，献帝重新划分的部落中，至少有两部，即纥骨氏与乙旃氏，原不属于鲜卑，献帝取消了原来的异姓酋长，派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作了这二部的酋长，又以所领部落之名作为他们的姓氏，以便于统治（参《乌桓与鲜卑》第246—247页）。从此，这二部便成了“鲜卑八部”和帝室十姓的组成部分。纥骨氏与乙旃氏原为何族呢？《北史·高车传》：高车种有护骨氏，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其三曰乙旃氏。按“纥”、“护”，古音同，纥骨氏即护骨氏。故上述二部，皆原本高车族，盖于呼伦池，与南迁之拓跋部相遇而融入其中。

拓跋部抵阴山后，渐与陆续南迁的高车发生融合。其可考证者如下：

### 三、解枇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解枇氏，后改为解氏。

《北史·高车传》：高车种有解枇氏，魏道武天兴四年“高车解枇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按“枇”、“批”，译言无定字。《官氏志》所载之解枇氏，当为高车族。

### 四、奇斤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奇斤氏，后改为奇氏。

《北史·高车传》：高车种有异奇斤氏。《胡姓考》奇氏条以为，《官氏志》所载之奇斤氏即高车异奇斤氏。

### 五、屋引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屋引氏，后改为房氏。

按屋引氏本高车族，史有明文（参《北史·高车传》），此不赘。

### 六、叱利氏。《官氏志》内入诸姓条：

叱利氏，后改为利氏。

按叱利氏，史籍又写作叱列氏、叱李氏。《通志·氏族略》：“叱利氏，一云叱列。西部大人，世为酋帅。”又，《北齐书·叱列平传》略云：叱列平字杀鬼，代郡西部人，世为酋帅，其子叱列